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金南, 刘建红, 耿慧慧

(中共邯郸市委党校, 河北 邯郸 056000)

[摘要]文章从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层面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意义, 主张针对种种关于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引导公民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5.04.025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5)04-082-04

2014年2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段话告诉我们, 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我国现代文明大厦的精神根脉,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和立脚点。只有把那些具有原创意义和积极内涵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现代文化的本根和主体, 才不会在价值观的问题上左右摇摆, 迷离失据。为此, 我们必须真正了解并礼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进而提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数千年文化沃土之中,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

中华文化的根源在“六经”之中。“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 (后《乐》经失传, 后世多称五经) 是纪录或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社会生活风貌的经典著作。是春秋战国时代儒、道、法、名、墨、阴阳、小说等各种学术流派著书立说的思想库。“六经”的思想精华主要表现在: 对天地万物与生命的敬重包容, 对“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对人文教化和审美情趣的普遍崇尚, 包括塑造道德人格与仁慈关爱的理念, 社会人伦秩序与国家和谐统一的思想, 天地人“三才”相接相处、各尽其能的智慧, 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中道观念、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辩证法则等等。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 重视人文, 关注实务; 寻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在心

灵的和谐; 重视礼乐教育与德服天下; 善于总结前人经验, 擅长鉴古知今; 倡导实践精神, 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

周代官方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六经”。其中《礼经》、《乐经》占有重要地位。《周礼·大司乐》提出乐教的六项道德要求: 为人忠诚中正不偏颇不徇私, 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友好相处、与人共事刚柔适度不走极端, 对祖先师长要懂得恭敬, 做人做事要恒常持久, 在家要孝敬父母、对兄弟友好关爱。这六种德行就是周代官方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乐教的目的上升到国家(天下)层面, 就是“以和邦国, 以谐万民, 以安宾客, 以悦远人”。

到了春秋初期, 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股肱之臣管仲及其管仲思想的继承人——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们主张: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认为“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维”是系物的大绳, 亦可理解为柱子, 说明礼义廉耻是治理国家的四条精神大纲亦或四根精神支柱, 离开了“四维”的维系和支撑, 国家大厦将会站立不住, 最终走向灭亡。各级官员和黎民百姓明白了礼义廉耻, 就不会作出超越本分、违背常规的事, 这样国家才会兴盛。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 周朝的礼乐教化、社会道德规范在乱世无法贯彻施行。孔子继往开来, 整理“六经”, 以此建立了以“仁爱”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 进一步形成了“仁、诚、忠、恕、孝、悌、礼、义、廉、耻”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念。

西汉时期两位著名学者贾谊、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总结出“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五种人伦规范, 从此形成中华民族普遍认同、一致推崇的道德规范, 成为炎黄子孙独树一帜的精神标识。

[投稿日期] 2015-08-05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河北省委讲师团系统科研课题(编号: 201543)

[作者简介] 马金南(1962-), 男, 河南辉县人, 研究方向: 文化、党建。

宋代以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取代“五经”，下移民间，远播海外，宋明理学家提出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故应爱人和一切物类即“民胞物与”的理念。

明清时代，“孝悌忠信”与“礼义廉耻”结合起来，称为“八德”。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不仅致力于民主共和政体的建设，而且重视精神文化建设。他采纳了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建议，把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概括为八个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除儒家思想外，中华传统文化中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道家、佛教的思想同样影响深远。“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修行处世准则。他们认为，佛教可以明心（参透人生），道教可以静心（宁静淡泊），儒学可以正心（匡正人品）。

因此，在思想道德即价值观意义上，儒、道、佛可谓各显神通。儒家提倡“仁爱忠恕”，其理想人格是做至善至美、才德完备的圣人；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其理想人格是做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的真人、超凡脱俗、顺应自然、达到无我境界的至人；佛家劝导“慈悲为怀”，其理想人格是做自己觉悟同时觉悟他人的佛陀、超度自己同时超度他人、解救众生苦难的菩萨。加上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的理念，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修身养性的理论，为中国人构筑了调节身心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中华文明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以四维”、“五常”、“八德”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成为绵延千年、泽被后世而且具有世界影响的精神文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早已成为普通中国人代代相传、自觉履行的道德信念。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许多国人身上体会到这些善根的存在，如河北保定诚信经营的“油条哥”刘洪安，救助两岁女童的广东拾荒阿婆陈贤妹，河南“一诺千金”照顾岳母33年的谢延信、河北邯郸孝老敬亲模范李国琴等等。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骨髓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淀了深厚的土壤。

二、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近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许多人

崇拜金钱与权力，人们的精神世界渐渐失落，日益感觉到安身立命的危机。一片浮躁当中，“国学热”、“儒学热”在民间悄然兴起，开始对中国自己本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人生智慧进行研究与探寻。屡屡曝光的腐败弊案，令人担忧的信仰危机和公民道德滑坡启示人们，除了不断建立健全制度、法治外，还需要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事实证明，我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具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今日，我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精神麻木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二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阴暗面进行深刻反省，这对文化革命与创新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西方、日本一些所谓学者、国内的“全盘西化”派、“文化虚无主义”者、“文化自戕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恶意歪曲和贬损。有些人把人类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许多病态、负面的东西统统扣在中国人头上，一谈起中国的“国民性”，就只有“劣根性”。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我们必须懂得，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固有的传统。抛弃传统就意味着丢掉根本，割断了民族的精神命脉，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的文化是必然会衰落和消亡的。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大地各时代、各地域、各民族的人群，各族群、各文化，在这片热土上经历了无数次碰撞冲突，交融互补，杂糅统一，以和而不同的生活态度与处世智慧，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从上古时代到今天，中华文化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屡遭重创，几番兴衰，但数千年间依然薪火相传，代代延续，从未中断，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人类文明史上曾出现不少文明古国，比如古埃及文化（存在了3000多年）、古巴比伦文化（存在了约300年）、古希腊文化（存在了约650年）古印度哈拉巴文化（存在了约550年），这些文明古国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文化断层，他们今天的后代子孙对祖先创造的文化有许多内容已经无法破译了。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柔韧性和连续性是无与伦比的。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华文化的优质性和生命力。中华文化不仅创造了自己民族精神和价值系统，而且对西方十七世纪启蒙资产阶级运动发挥过借鉴作用。西方国家一些著名的《人权宣言》比如《法国人权宣言》还有《世界伦理宣言》等都汲

取了儒家的“仁爱忠恕”的思想。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如果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20世纪70年代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先生的对话集《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认为：“真正能够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88年在巴黎聚会，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因此，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中华文化自身的宝藏及其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时，才能明白，很多否定中华文化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只是以臆想中的西方来批判被戴上有色眼镜的中国。事实告诉我们，民族文化不容亵渎和歪曲，有良知的中国人要拨乱反正，要正本清源，切实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特别是价值观自信。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能建立在荒芜的文化沙漠上，不能建立在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彻底决裂背叛与信口雌黄上，只有礼敬并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之作为重建现代社会世道人心的重要基石，才能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应有作用。

三、以传统文化精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双向交流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渗透的结晶。但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场”，使公民把积极进步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纳入自己的认知范围，并进一步消化、筛选、转化为个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从而实现公民行为观念与道德生活环境的良性互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民本观念、推重诚信、维护正义、崇尚和合、追求大同以及“乐教六德”、“四维”、“五常”、“八德”等内涵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出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

应该以此为基础，引导公民从三个方面把握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第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文化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枝叶而是本根，不是功用而是本体，不是客位而是本位，不是客体、对象而是主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之地。由此产生的文明才是中国真正的、健康的现代文明，那些一味蔑视甚至刻意丑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行为，是数典忘祖，是不负责任。为此，每一个炎黄子孙应把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担当，以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融合、汲取消化进而同化不同文化的能力。世界文化多种多样、各有所长。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只有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有利于本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假如一味封闭自守，夜郎自大，只会丧失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最终走向衰落。中华文化所以能够几千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襟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曾有过闭关锁国、敝帚自珍以至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但是开放包容始终贯穿在华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中。早在两汉时期，西域的文化、印度的佛教先后传入中国，到唐朝，西域文化与佛教得到广泛传播，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玄奘取经成为中外交流史上的世代相传的佳话。从宋代开始，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元、明两代，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为代表的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或游学、或传教、或经商，以各种方式参与文化交流，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外来文化具有神奇的同化能力，许多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都同中华文化实现了有机融合并且展现出新的面貌。比如佛教的禅宗，就是对印度佛教的再造，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与再造力。因此，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会排斥借鉴人类其他古今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精华与优长，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更加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第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决不意味着照搬历史，泥古不化，而是要随时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不断进行文化创新。毋庸讳言，传统文化中确

实存在一些需要摒弃的糟粕，清朝官员辜鸿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入挖掘、提炼那些对现实有参照意义和思想启迪价值的内容，进而发扬光大，使之形成滋养当代民族精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此为根，才能提高当代中国公民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理性的道德选择能力，提高公民的道德自觉，增强其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最终树立公民价值观信仰，构建优良的公民道德人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
- [2] 国务院新闻办,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外文出版社, 2014.
- [3] 商聚德, 等.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 [4] 王荣花, 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责任编辑 王云江]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er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 Jin-nan, Liu Jian-hong, Geng Hui-hui

(Party School of Hand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ndan 056000, China)

Summary: From the moral and values level describ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rguing that according to various misconceptions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nd make things right, guiding citizens grasp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rying forwar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core values conserv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上接第 73 页)

参考文献：

- [1] Alt, C. *Virginia Woolf and the Study of N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Huggan, G. & H. Tiff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3] 盛宁. 文学: 鉴赏与思考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4] 瞿世镜. 伍尔夫研究 [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8.
- [5] 高奋. 西方女性独白 [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张耕云. 生命的栖居与超越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Brief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Virginia Woolf's feminist poetics

ZHENG Ming-yua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As a leader of feminist poetics, Woolf's feminist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can be traced up in the developing journey of our contemporary western feminist poetics in all-around aspect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basic prerequisites as well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rections. Her gender ideology has changed the usual thinking way of text criticism discourse within recent two hundred years, and opened up a new research platform leading to broad social reality and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for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feminist poetics. This literary theory is both an important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 an essential architectural designer of the later feminist poetics solutions.

Key words: Woolf; feminism; poetics